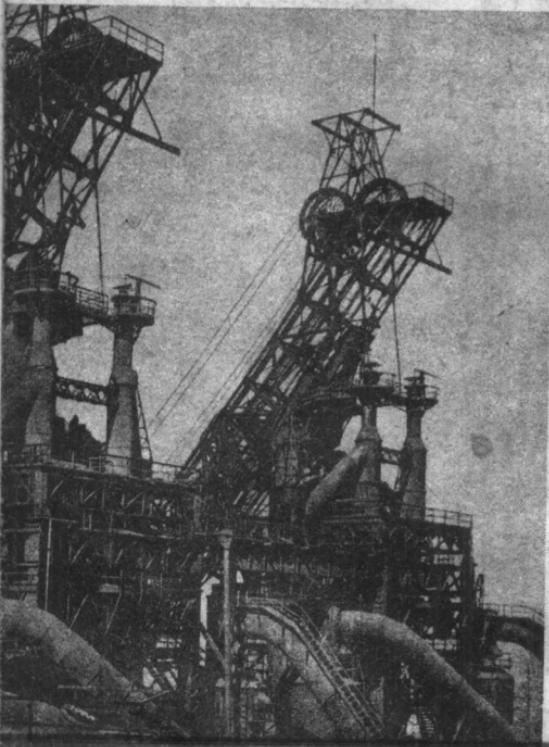


十之書叢設建濟經

劃計做樣怎



印編居書華新北東

十之書叢設達濟經

劃計做樣怎



印綱店書華新北東

怎樣做計劃

編著 東北新華書局編審部

印行者 東北新華書局

一九五〇年二月出版

1—3000(套)

例　　言

隨着東北全部的解放，東北已轉入經濟建設時期；尤其在東北與蘇聯訂立貿易協定後，東北的經濟建設將推向新的階段。東北因先由戰爭轉入建設，又與蘇聯毗鄰，能首先獲得她的幫助，所以對全國的經濟說來，它將會起着支援作用。為適應偉大的經濟建設的需要，我們編輯這個經濟建設小叢書，以供從事於東北經建工作及研究東北經建理論的同志參考之用。

本叢書的編輯內容，是搜集中蘇報章、雜誌及專著上有關經建的論文與資料，為東北目前經濟建設所亟需者，按其內容，分編成冊，使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驗與東北經濟建設的具體情況相參照。

目前為適應社會的迫切需要，本叢書暫以力能搜集到的論文與資料為限，日後如發現有新的論文與資料，再版時再行增補。我們的資料缺乏，人力不够，缺點在所難免，尚希各機關學校諸同志多予批評，如能惠賜有關經建之論文與資料，這更是我們所無任歡迎與感激的。

編者

一九四九·九·六

目 次

論經濟計劃

(麥真貝爾格 一九四〇年) (二)

關於製訂下度計劃準備工作的指示

(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 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 (二八)

完成製訂下度計劃的準備工作

(呂東在各局局長及計劃處長會議上的報告) (四三)

關於審核一九五〇年生產修建計劃會議上的報告

(呂東傳達關於審核計劃問題的意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 (五三)

關於做計劃問題的報告

(王鶴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七〇)

關於做計劃具體問題的報告

(呂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八〇)

關於檢查一九五〇年一月份生產計劃的結論

(王鶴壽：在擴大部務會議上的發言 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 (一〇一)

旅大向蘇聯學習訂計劃的總結

(摘自楊思九：『向蘇學習總結』) (一〇八)

蘇聯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計劃性

(費多雪夫) (一一一)

蘇聯工業企業的生產計劃

(費多雪夫) (一一九)

論經濟計劃

麥真貝爾格

經濟發展的計劃性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國家有決定意義的優點。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組織起來的勞動者們，在人類歷史中第一次地『根據事前籌劃的計劃』（恩格斯語），有意識地管理着社會生產力。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談道：『人們有時候引證出美國和德國的經濟機關，彷彿它們也是按照計劃領導着國民經濟似的。同志們，不是的。在那裏是並未達到也不可能達到這一地步的，只要在那裏仍舊存在着資本主義制度。』（註二）

爲了實現國民經濟的計劃化，首先必須由無產階級來掌握國家政權。只有依靠這一爭取來的政權，工人階級才有可能從資產階級手中把有力的生產手段奪取過來，使之爲社會所共有，『藉此，它（指工人階級——譯者）從生產力的現有的資本主義性質中，把生產力解放出來，而對它的社會性，予以充分發展的自由。』（註二）

在這些條件下，清除了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人性之間對立的矛盾。在社會

主義的社會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存在着完全的一致，它消滅了經濟危機，排除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浪費以及生產力的破壞。而國民經濟的計劃化——社會物質生產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的統一計劃的發展——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充分相適應的表現。

國民經濟的計劃化，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與逐步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經營組織工作中的有力的槓桿。莫洛托夫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談道：『在完成「趕上並超過」這項任務的時候，我們去依靠甚麼呢？我們可以簡單的回答：我們去依靠計劃，首先是依靠第三次五年計劃。』（註三）

但是也正因為計劃化在我國已形成了一種有力的組織力量，所以計劃性的領導的成敗，其關係非常重大。

蘇聯國民經濟的範圍是那樣廣泛，基本建設的範圍又是那樣龐大，致使在經濟的計劃性的領導中，任何一種錯誤和計算上的誤謬，都會給國家造成莫大的損失。這就是為什麼黨對計劃工作者全部大軍，提出了『……使我們的經濟領導成為最富有遠見的、最能明察秋毫的、最沒有錯誤的領導』（斯大林語）的要求。

三次斯大林五年計劃期中，工業的所有各部門與農業的增長，使經濟領導方面的各項任務更加複雜起來。在新的條件下實行這一領導，要求我們詳細劃分經濟方面的各人民委員部，增加人民委

員部的數目，以及在蘇維埃聯盟人民委員會議之下設立一系列的新的委員會等。上述各項措施的目的，都在於加強各人民委員部對各企業的領導，使這一領導更為有效，更為具體。

但對經濟的業務上的領導劃分得愈詳細，則把許多的經濟機關聯合在一起，以及保證全部經濟工作的統一等任務，也愈為現實，愈為迫切。

執行各企業的業務領導工作的人民委員部、管理局以及其他經濟機關，為數非常繁多。在這種條件下，執行計劃工作中，如果容許各種『游擊作風』的存在，暴露出各領導單位的分裂主義，同時各經濟環節之間失掉了應有的合作，那末就會造成極端危險的結果。因為這樣一來，不可避免地將造成不均衡不和諧的現象，同時會給國民經濟造成損失。正因為如此，在解決蘇聯的基本經濟任務，特別是在實現第三次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各項任務這點上，今後進一步的成就，主要是以國民經濟的計劃化工作的堅決改善為轉移的。

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所要求的計劃性的領導，必須建立在具體了解國民經濟的情況的基礎上；它必須能够及時地發現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實際需要以及它們所擁有的但並未加以利用的可能性；而這種領導更必須保證發展國民經濟的國家計劃，能夠無條件地完成。

我們的全部計劃工作的最大缺點在於：『我們還沒有真正的經濟計劃以及對計劃的完成的應有保證。』（註四）

國民經濟計劃必須保證我國各經濟地區與物質生產各部門的發展的正確的相互關係和有機的聯繫，並預防國民經濟各部門之中不均衡現象的發生。

直到今天我們的計劃工作，在許多方面仍舊是文牘主義的、統計式的東西。這種工作和實際的經濟情況相脫節，它表現出對各個經濟部門的實際情況的認識不足，表現出對國民經濟的需要及其未經利用的可能性的缺乏認識。這些事實造成了計劃規定的任務和它們的物質保證之間的分歧，造成了未能及時預防在物質生產的有決定意義的個別部門中發生不均衡的現象（冶金、發電廠的建立等方而的落後），並且使我們看到計劃執行進程的真正的檢查的缺乏。

應該直率地指出：如果我們的計劃工作幹部掌握了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計劃化的學說的本質，那末計劃工作中的誤算和失錯，就可以減少得不知凡幾，而計劃性的領導的成就也將大見增加。

如果不以我們的幹部缺乏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理論的鍛鍊來解釋，那末，爲甚麼許多的計劃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仍未能清除某些有害的偏見，而這些偏見都是由列寧和斯大林在過去揭露過並在理論上擊潰了的。

在這些偏見之中，首先應該指出的是：關於計劃的本質的文牘主義的官僚主義的理解，在這種情形下，計劃的外部形式（各種數字指標）是被誤認爲計劃性的領導的本質。根據這樣的觀念，計劃

劃工作將僅限於編製計劃的文件，而執行計劃的領導，則被擱棄於計劃工作範圍以外。這種觀點會造成對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過程的檢查的忽視，使檢查變成了官僚主義的，不能在計劃執行進程中，及時發現出錯誤和缺陷，而只能在事後對其結果加以評定。這種對計劃工作的本質的錯誤的認識，和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計劃化的理論是毫無共通之處的。

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計劃化並不等於編製『一堆一堆的圖表』，在這些圖表的形式下，規定出計劃的任務。真正的經濟生產計劃——斯大林同志說——是創造新生活的千百萬人民的活生生的實際活動。

計劃——這是『全國人民的勞動和我們全部工作的意志的統一和目標的統一』（莫洛托夫語）。

這就是為什麼要說計劃的編製並不是計劃工作的最後環節，而是這一工作的開始。真正的計劃性的領導是在計劃編製以後開展的。因此，斯大林同志不止一次地強調了編製計劃和為實現這一計劃而競爭之間的密切聯繫。計劃工作如果與實際的經濟情況相脫節，如果不考慮執行計劃所規定的任務的實際結果，那末這種計劃工作就會變成書齋裏的毫無內容的東西。這種『計劃工作』就沒有力量來防止經濟工作中的錯誤和失敗。

對這種情況，莫洛托夫同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以電氣經濟發展的計

劃化爲例，剖切地予以說明：

『第三次五年計劃對於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某些缺點，必須特別加以考慮。我們可以引證電氣經濟的實際情況爲例來說明。

大家知道，第二次五年計劃中電力生產計劃幾乎完全完成——完成了百分之九六。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發電廠的建設計劃只完成了一半左右——完成了百分之五五。因此，第二次五年計劃中電力生產的增長，就造成了發電廠的某種程度的過度負荷。很明顯地，這種狀態是不正常的。這一事實只有在國民經濟的發展的計劃工作本身具有嚴重的缺點的情形下，方能產生；對於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工作來說，電力的供應率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的。

人們可以說：在上述那種情形下，事實並不是計劃執行的工作中有多大缺點——即發電廠建設本身有缺點和動力設備的生產的落後——樹立計劃的工作中也就有多大缺點。但是，對這種判斷，我們是不能認爲正確的。如果在計劃工作中不能考慮到計劃的執行進程，那末我們就不能認爲這種計劃是良好的。這種書齋裏的、脫離實際的計劃是不值錢的。』（註五）

計劃是在自己的實現過程中，根據爲完成計劃而鬪爭的羣衆的創造性的經驗，經過檢查、修正和改善的。

在計劃的執行進程中，可能發現出新的後備力量與動員使我們的運動加速前進的新的源泉，並

防止不均衡的現象。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談到社會主義計劃化的這一原則時，引證了列寧在討論全俄電氣化委員會計劃時的意義深遠的發言：「我們的黨的綱領不應僅止於黨的綱領。它並須變成我們的經濟建設綱領，否則，它就會變成黨的無用的綱領。它必須被追加為黨的第二綱領，它必須成為重建全部國民經濟並使之提高到現代技術水平的工作計劃……我們必須確定一個一定的計劃，當然，這僅是按照初步的接近而通過的計劃。黨的這一綱領不會像我們的真正的綱領那樣不易改變，我們的真正的綱領只有在黨代表大會上才能有所改變。這一綱領却不是這樣，它將逐日在每一修理廠，每一鄉村被人們加以改善、研究、補充和改變……注意科學和實踐的各種經驗，需要在現場不斷努力，使計劃較預定期限提前完成，使羣衆知道：經驗可以縮短恢復所有工業的期限。這完全要靠我們的努力。起來！每個修理廠，每個機車庫，每個省都來改善經營方式，那末我們一定能縮短期限。同時現在我們就正在縮短着它。」（註六）

黨與政府遵循列寧和斯大林的指示，變更並改善了我們的計劃，保證了兩次斯大林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

直到現在，計劃工作的主要缺點是：對計劃執行情況檢查的注意不够。這不能不說是在計劃性的經濟領導中的消極的表現，同時並削弱了計劃機關的意義。

「我們對於計劃執行情況的檢查，未曾予以應有的注意。我們的敵人常常利用這一點而加害於我們。必須消滅這種現象，那末我們的計劃在國家的經濟生活中將能發生更大的作用。」（註七）

適當地規定計劃執行情況的檢查，計劃機關定能在根本上改善自己的計劃的質量。計劃執行情況的檢查，將能以經濟生活的具體意義充實既定的計劃，並將有助於可能被計劃所動員的潛在儲備的發現，以及作出更富有生命力的與更現實的計劃案。必須像下面這樣編製計劃，即：使計劃能够很容易地動員數百萬人民去完成各項任務；使根據計劃所組織的所有的經濟工作能够得到更充分的檢查。

爲了檢查經濟工作根據既定計劃進行的情形，爲了在計劃執行的進程中有意識地、有意義地對某些個別的部門、地區、期限予以訂正，必須具有一個『軌範』和『標準』。這種『軌範』和『標準』就是政治經濟的與技術的計劃目標及其中心思想，一切特殊的任務都爲這一中心思想所解決。這就是說：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計劃，不應成爲一堆說明各種不同的事物的統計圖表，它的內部必須由表現得極其明顯的並貫徹了計劃的所有環節的、統一的中心思想所構成、所結合。

但是，直到現在維·奎比雪夫同志的下面的指示，仍有相當的價值，即在我們的各項計劃中，還是常常『存在着過多的，假如可以這樣說，「統計的，算術的」傾向；缺乏表現得非常明顯的技術思想。』（註八）

布爾塞維克的策略領導的一個原則是：「要在每個一定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一抓住這個環節，便能掌握整個鏈條而準備好達到戰略成功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是要從黨面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一個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是當時工作的中心點，實行這個任務，就能保證順利解決其他一切當前任務。」（註九）

這一項原則適用於計劃化的目標上面，就是說：要求在每個一定時機，找出計劃的各主導環節，它們能決定計劃的成功。

計劃工作中的最大缺陷就是在實際上便忘掉這一計劃工作的原則，人民的敵人惡毒地利用這一缺陷來達到他們叛逆的目的。均等地處理國民經濟各部門與廣泛地無重點地擴展基本建設，都能造成國民經濟各決定部分的落後與不均衡現象的發生。

真正的經濟計劃工作和這種作法沒有任何共通之點。真正的經濟計劃工作要求：計劃的編製，要從確定各主導環節作起；所有物質的、財政的與勞動的資源要充分地保證這些環節的計劃的完成，因為整個經濟鎖鏈的成功是有賴於這些主導環節的。

我們引用一九四一年經濟任務的執行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就會立即認清：蘇聯一切最重要的經濟的與國防的任務的解決，都依賴於黑色冶金的發展。我們祖國的廣大領土，與需要開發的各種豐富的天然資源，以及國防的利益確定了加緊發展鐵路建設的必要性。斯大林同志非常地指示

出鐵路在蘇聯的意義說：『鐵路之於蘇聯，如同艦隊之於英國。』但是鐵路的建設首先需要黑金屬。蘇聯基本經濟任務的解決關係於蘇維埃機器製造業的快速度的增長，而機器製造業也需要金屬。在國防的需要方面，也同樣可以這樣說。

所有這些都是說計劃必須這樣編製，即：使一切物質資源（建築材料、礦石、煤炭、運輸）財政資源（對基本建設的撥款，流動資金），以及勞動資源（招募工人與職業學校、礦廠學校的學生等）充分保證冶金任務的無條件的完成。經濟發展的計劃性的領導必須從下面這一項任務出發，即：不論在任何條件下，也要保證黑色冶金任務的完成。

國民經濟計劃必須保證：將絕大部分的資金，集中於社會主義建設中具有決定性的各部分。計劃執行的進程可能有本質上的改變，新的困難與任務可能發生，在某種情形下也可能必須進行若干重要的修改與訂正，但是布爾塞維克的計劃領導的技巧却在於：機動地運用一切資源；動員直接的與間接的儲備；重新配備一切力量，以達到決定我們的整個前進的那些主導部門的無條件的成功。

爲使計劃發生一種作爲動員千百萬羣衆去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濟任務的有力工具的作用，計劃必須是一個先進的、有科學根據的、和現實的。

黨要求計劃工作人員，在提問題時要有廣泛的主動性與革命的勇氣；同時，在估計情況時要有布爾塞維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現實性。

「布爾塞維主義所以有過去的勝利與現在的勝利，是因為實際考慮到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也是因為布爾塞維克黨人能正視現實，能適應環境與各種鬭爭條件而機動地變化，並能使這種現實性、冷靜性與堅強的勝利的信念、勇氣、決心相結合。」（註十）

在計劃工作中，應與兩種偏向進行鬭爭。一種就是官僚主義的墨守成規，為數字所奴役，逃避困難，不願真實地為動員國民經濟中所存在的大量儲備而鬭爭，儘管這種儲備是能够解決最困難的計劃任務的。

具有類似這種偏向的人，不可能或不希望了解：蘇聯的基本經濟任務的實現，特別是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正在展開的條件下，假如不去克服困難，不能不顧一切困難勇往直前，不願意為了既定的歷史的目標付出巨大的犧牲，那末是不可能成功的。不消說，計劃工作中的這種「文牘主義者」，最好還是讓他們離開計劃工作遠一些。

另外一種就是我們常常遇到的另一種偏向——官僚主義的最高綱領主義，完全忘掉了計劃編製人員的基本任務——冷靜地考慮現實與現有的物資儲備、財政、勞動力；深刻地研究經濟情況，計算資源；以及不倦地為發現與動員實際的儲備而鬭爭——而以堂皇的詞句與極大的數字所表現的左傾誇大狂。

這種空想的、缺乏現實性的計劃的害處在於不能動員幹部並削除他們對勝利的信心；使經濟趨